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动力观 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

谢霄男

(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 成都 611731)

摘要:深化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课题。原因在于:改革是发展生产力的客观需要,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手段,是新旧体制更替的助产婆。改革既要解放生产力,又要发展生产力,要敢于涉险滩,要改善社会主义具体制度。为此要秉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公平分担改革成本以及重视顶层设计的原则。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动力观;社会发展规律

中图分类号:D6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5)04-0012-02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5.04.004

On the Deepening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Development Laws Through the Concept of Reform Impetu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XIE Xiao-nan

(School of Marxist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engdu 611731, China)

Abstract: It is an important historic project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s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 reason is as follows: reform is the objective need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the effective means to resolve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a catalyst for the substitution of a new system for an old one. Reform means liberating productive forces, developing productive forces, daring to take risks and improving on the socialist system. To this end, we must uphold the interests of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fairly share the reform costs and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top-level design.

Key Word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ncept of reform impetus; law of social development

把握社会的发展规律,是一个长期、复杂、艰巨的历史性课题。改革开放后,面对我国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党和政府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改革为动力,创造性地推进了各项工作的发展,由此我们深化了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一、历史性课题:深化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一)改革是发展生产力的客观需要

每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基本矛盾都是不同的。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曾不无感慨地说:“多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就是以

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1][141]}他清醒地认识到,“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1][149]}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就是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当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与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的时候,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这个时候,就需要改革,以扫清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改革能够优化社会结构、促进科学管理、创造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条件。

(二)改革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手段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当前,我国的社会

收稿日期:2015-03-1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4AKS020);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13JD710024)

作者简介:谢霄男(1987-),男,内蒙古赤峰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与社会发展研究。

基本矛盾具有非对抗性。这就是说,改革并不需要改变国家的根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而只需革除生产关系中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因素。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兴利除弊,使国家的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因此,改革是国家社会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手段。

(三)改革是新旧体制更替的助产婆

追溯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已经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设想的人类历史阶段论,在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还要经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而我国跨越了资本主义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我国在这一跨越过程中,曾面对过一系列的困扰。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唯一经济制度,而市场经济被打上了资本主义的标签。处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我国,在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发展缓慢,人民物质生活极端匮乏。改革开放之后,我党制定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审时度势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全新的体制,取代了旧有的、不利于我国社会发展的单一计划经济体制,由此我国迎来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

二、宝贵经验:国家领导人改革动力论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

(一)改革既要解放生产力,又要发展生产力

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时,曾一度出现了失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把阶级斗争看成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结果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指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2]119}由此他指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1]96}他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在解放生产力方面的共同点。

(二)改革要敢于涉险滩

从党的十八大迄今,改革要“敢于涉险滩”频繁地见诸报端。习近平在广东考察工作时强调: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环,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习近平的这一席话,充分表达了深化改革的勇气和信心。我国在全面深化改革中面临着诸多前所未有的新困难、新问题,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只能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把改革难度较大的任务放在后面,改革越向深层次推进,所触及的矛盾就越深,牵涉到的利益场就越复杂。

没有敢于涉险滩的勇气,就难以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三)改革要改善社会主义具体制度

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动力论的重要贡献在于他主张要改善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他认为,我国的改革是一项全面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3]。改善社会主义具体制度,主要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以及科技体制改革。“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2]327}。可以说,邓小平的改革实践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学说的创造性运用,他全面地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动力理论。

三、深刻启示:继续深化认识的三个原则

(一)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我们进行改革最根本的原则就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就是要革除损害大多数人利益的不合理的社会利益格局和利益获取机制,保护和谋取大多数人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因此,我们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出台改革政策时,一定要以保护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尽量使绝大多数人受益,不能让他们只承受改革的阵痛和代价,让少数人在社会利益协调中受益。在社会利益协调中,剥夺传统利益格局中少数人的既得利益,配置给社会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逐步建立起公平合理的社会利益格局和利益获取机制。必须改变目前国有企业工人以及农民和知识分子等在改革中受益较少的状况,给予他们更多的利益和实惠,使其成为改革的可靠社会基础。

(二)公平分担改革成本

进行体制改革既有收益,也必须付出成本甚至代价。这就有一个改革收益如何分配,改革成本如何分担的问题。如果出现改革收益集中于少数人,或让少数人以不合法的手段占有大部分改革收益,而改革成本则让大多数人分担,或将改革成本以各种方式转嫁到大多数社会成员身上,给人们以过去改革等同于增加收入,现在改革等同于增加支出的印象。这样不仅会超过社会成员的经济和心理承受能力,而且会直接破坏改革的声誉,降低社会成员对改革的支持度。因为利益分配的失衡很可能会形成利益冲突的倒逼机制,强行闯关则会使改革受阻和对社会稳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推进改革,获取改革的动力,要通过舆论宣传和思想教育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认识到,改革最终会让他们获取利益,而不是牺牲他们的利益,当然他们也要承担改革成本。在改革的政策导向和具体措施上,必须尽快改变收益分配与成本分担的不统一的状况,不能使改革成本过于集中在(下转第16页)

再引用原文证明系统的成立,最后得出他自己的研究结论。

具体而言,首先,罗光借士林哲学的形上“存有论”对中国的传统形而上学进行分解与重构。虽然“存有”是西方哲学的概念,但不能否认中国哲学也讲“存有论”,所以就不能否认中国哲学形而上的存在与合理性。罗光指出,贯穿儒家、道家、佛家思想的系统就是生命哲学,这个系统以“生生”为核心概念。中国哲学是讲究生命的,是讲究活动的,这个动态的生命就是“生生”,所以“生生”是动的“存有”,中国哲学家或思想家的思想都是以生命的激情来谈论“生生”的“存有论”。其次,罗光用因果逻辑诠释中国哲学,突出了中国哲学的“实在论”因素。他指出中国哲学肯定了实体的存在,并强调名实相符,这是一种“实在论”,但是这种“实在论”在某些方面如认识论方面还缺少论证的系统,所以他主张用士林哲学特别是托马斯哲学来弥补这一缺憾。为了作这种弥补和整合的工作,罗光在治学中常常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互相比照,互相贯通,互相诠释,以求得到一个完备的答案。这种诠释就使得中国哲学获得了一个新的诠释路径。

第五,罗光对中国哲学的诠释带有其身份特征。罗光是天主教主教,他一生的使命就是“中国福音化,福音中国化”,这种使命也体现在他的治学当中。他说:“我写中国哲学思想史,是用西洋哲学的方法。我是一位天主教教士,而且是总主教,我作中国哲学的研究,不能和我的身份脱离关系。教士的职务是宣传教义。我便想以中国哲学思想解释天主教的教义,使天主教可以为中国人所懂,进入中国文化界。”

(上接第 13 页)某个社会群体或社会阶层身上,真正尽可能使最广大的人民受益。要使改革受益者均能承担一定的改革成本,从财政、税收、价格、利率、社会保障、社会政策等多方面尽快建立相对合理的改革成本分摊机制,做到收益分配与成本分担的统一。

(三)重视顶层设计

从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只有当改革动力被转化为改革政策时,才能真正地实现一个国家经济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一个国家的改革进程,往往不是因为改革的动力不足,而是缺乏顶层设计。从认识论角度看,改革政策被决策层制定出来,并被广大人民群众认可,是有效改革的认识论基础。从决策者的改革意志来讲,如果决策层缺乏强烈的改革意志,即便民众有着巨大的改革呼声,也无法顺利地将改革的动力转化为改革政策。当前,世界各个国家都面临着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的巨大挑战,而所有这些挑战都只能通过改革得到解决。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制定改革政策,是各国决策者推动改革都需要关注的首要问题。从经济层面看,我国是公

罗光的学术研究是与其身份分不开的,他一生致力于使天主教文化进入中国,使中国人也能接受福音。所以罗光虽不以传教为写作目的,却也能传教铺垫道路。一方面罗光在古老的中国哲学中,发掘可以与士林哲学相契接的地方;另一方面罗光也对天主教神学作出中国化的诠释,这种努力避免了文化冲突,使士林哲学与中国哲学、信仰与文化有了可沟通的桥梁。

在中国文化中,罗光找到了“生生”。“生生”就是变易,而变易是实体的变易,所以就与西方的“存有”相接连,只不过西方以“静”讲“存有”,中国是用“动”说明“存有”,中西方哲学实质上有共同的形上基础。在天主教信仰中,罗光找到了“上帝”。他认为“上帝”就是中国人所谓的“天”,在古老的中国哲人心里,“天”就是一位有人格的神。而天主教对未来生活或者是永生生活的追求则可以提升中国哲学的道德追求,超越以往哲学的探求,使人生获得真正的“安身立命”。

总之,罗光本着以上几项原则写成了九卷本的《中国哲学思想史》,因之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中国哲学思想史》是用士林哲学和天主教神学对中国哲学所进行的诠释,也是以中国哲学融合西方哲学的一种新的尝试。虽然罗光的这种诠释是以基督教哲学为背景与比较基点的,带有其个人信仰的色彩,但是其在中国哲学史上以及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重要学术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并且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

(责任编辑:白丽娟)

有制占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应该为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而现实中,个别国有企业却发展为既得利益集团,在客观上挤占了一定的公共资源,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民营企业的壮大以及市场的健康发展。错综复杂的利益交织在一起,成为顶层设计面临的重大问题。改革究竟革谁的“命”?从我国当下的现实国情来看,首要的问题就是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为改革扫清道路。

参考文献:

- [1]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2]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3]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607.

(责任编辑:夏玉玲)